

新视野下的农业科技史、农村经济史与农业文化遗产研究

——中国农业历史学会 2016 年年会暨广东农史研究会
第十次学术研讨会综述

谢 萍 杨品优 赵 飞

(华南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642)

【中图分类号】S-09; 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5-0126-07

2016 年 6 月 24-27 日,由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华南农业大学主办,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所、广东农史研究会承办的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暨 2016 年年会与广东农史研究会第十次学术研讨会在华南农业大学召开,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郑州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全国各地 50 余家单位的 120 余名领导、专家和学者出席了此次盛会。中国农业历史学会 2016 年年会暨广东农史研究会第十次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 60 余篇,会议分大会报告和分会报告两部分,研讨会围绕“历史上的作物栽培、作物引种与农业科技”、“历史上的农村经济、农田水利、农业生态与农业开发”和“农业遗产与农业文化”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与交流。兹将会议交流按专题综述如下。

一、历史上的作物栽培、作物引种与农业科技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蕴藏丰富的农业史资料。对先秦农业的研究有赖于对甲骨文等其它考古资料解读。王星光、张军涛(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在《甲骨文与殷商农时探析》文中依据殷商甲骨文中的记载,认为商代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农时观念,农业生产诸环节都有具体时间安排;黍、粟、稻、菽等作物的管理集中于耕作、播种和收获三个阶段;殷商时的农事与历法息息相关,其农时观中夹杂有宗教迷信色彩。刘兴林(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的《先秦两汉农作物分布和组合的考古学研究》利用考古发现的作物遗存探讨先秦两汉时期各地农作物的分布概况与组合演变,作者认为通过对先秦两汉主要粮食作物品种的时空分布、地位和组合情况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国传统农业的形成过程,历史时期农作物的考古学研究大有作为。

作物的栽培及加工技术是中国农史研究的传统课题。郭声波、周航(暨南大学历史系)《论唐宋时期荔枝的保鲜技术和加工技术》认为在保鲜技术方面,唐宋时期人们已懂得用竹筒、竹笼、瓷壶等密闭容器盛装鲜荔,并注意到采摘时留枝叶有利于保鲜,还发明了以蜡封蒂的保鲜方法;在荔枝加工方面,

[收稿日期] 2016-08-16

[作者简介] 谢 萍(1976-),女,硕士,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科技史及生态变迁史;

杨品优(1971-),男,历史学博士,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经济史及中国农业史;赵 飞(1980-),男,在读博士生,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遗产及旅游规划。

有红盐之法、白晒之法、蜜煎之法,还出现了荔枝汤、荔枝酒等多种由荔枝加工的饮食,反映唐宋果树栽培与保鲜技术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包艳杰、张浩、黄兴华(周口师范学院)《宋代蔬菜种植技术与蔬食文化的形成》认为在早期垄作技术的基础上,宋代种植蔬菜分为大田种植和畦种,畦种法主要用于春季栽培蔬菜,大田种植的蔬菜一般是用以出售。由于种植技术的进步,宋代蔬菜供应数量充足。杜新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气论与医道:宋代以降士人对施肥理论的阐述》探析了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古人对施肥理论进行本土化建构的过程,通过了解古人在解决土地缘何缺失肥力,何种物质可以用作补充地力,施肥应该遵循什么原则等诸多问题,可以了解中国古代本土理论的生成、演化模式,亦可窥见古代医学对农学影响之一斑。马刚、王宝卿(青岛农业大学齐民书院)的《葵菜的起源发展变迁及其影响研究》从葵菜的起源产地与分类、葵菜的发展历史及其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变迁、葵菜的食药价值及其应用情况三个方面,对葵菜历史进行详尽的梳理,认为葵菜起源于中国,发展盛行于秦汉之前,隋唐之后地位逐步下降,明清之后随着美洲优良蔬菜作物的引进,在中国北方葵菜主要作为医药保健之用。赵飞、林舒婷(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所)《新会蒲葵栽培史考略》对历史时期广东新会蒲葵栽培发展史做了一个全面的考证,认为新会蒲葵栽培与葵扇销售、葵艺水平息息相关,葵制品的市场销路最终主导了新会蒲葵栽培的盛衰,作者还提出了实现新会蒲葵这一宝贵农业遗产再度繁盛的途径。张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人类衣着材料结构的演变——以农史为主要视角的考察》以农史为主要视角,考察了人类衣着材料结构的演变过程,认为人类的衣着材料历经了植物枝叶、草阶段,动物皮阶段,以麻类作物为主的阶段,以棉花为主的纺织原料阶段,以化纤为主、辅以棉毛麻丝皮革等多种材料并存的阶段,认为化纤的异军突起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业(农林牧副渔业)的重要性。何峻、陈伟明(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的《中国历代贡茶院演变史》分唐以前、唐至五代、宋元、明清四个时期对贡茶院的数量、贡茶分布和各院的概况进行分析,基本厘清了历代具有代表性的贡茶院情况,对贡茶院的发展演变做了一个大致的勾画,并对历代不同官办形式的贡茶院进行了分类、分析和解读。曹茂、秦莹(云南农业大学)《古代云南少数民族粮食作物的对外交流探析》以云南少数民族从印缅道引入的玉米、马铃薯和红薯等重要粮食作物为研究对象,认为通过推广种植玉米、马铃薯和红薯等高产粮食作物,不仅让地处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解决了粮食问题,还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外高档补品的引进也受到关注,冷东(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广州十三行与燕窝鱼翅在中国的引进与传播》探析广州十三行在燕窝鱼翅在中国的引进与传播中所起的作用,认为在乾隆年间清朝政府实行“一口通商”政策期间,广州十三行在燕窝和鱼翅的进口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得燕窝鱼翅的中国消费市场明显扩大,消费区域由沿海渐至内地,由较大城市向城镇扩展。

涉及到兽医学的论文也有两篇,朱绯、王思明(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浅析民国兽医图书中的兽医学发展》以民国时期的兽医图书为研究对象,探讨民国时期兽医图书的内容变化,进而研究兽医学在民国时期的发展与变迁,并认为,兽医图书以实用为主,紧紧围绕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对我国家畜疾病进行了有效的控制,并逐渐完善了我国的现代兽医学体系。王成(四川省筠连县畜牧水产局)、贺常亮(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等的《清代〈三农纪〉之畜牧兽医技术初探》对记载巴蜀古代农业的大型地方综合农书《三农纪》的主要内容与畜牧兽医技术进行初步梳理,促进了《三农纪》进一步研究深入。

美洲作物的栽培、传播及其影响是农史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与会学者对小麦、番薯、玉米等美洲作物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小麦是一种古老作物,人类很早就驯化及栽培这种植物,张兰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旧大陆小麦在新大陆的栽种及传播》探讨了小麦在新大陆各地区的栽培技术与传播过程,认为随着欧洲移民到来,小麦才逐步传入美洲,被迅速推广,并成为人们的主食,小麦产业也随之兴盛,小麦是新旧大陆农业文明交流的结晶。一般认为,美洲作物在中国推广的模式

为:“人口压力→粮食短缺→新作物种植”,但王保宁(山东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有不同的观点,在《灾荒还是人口压力?——对番薯推广的再讨论》一文中,他从气候与农学的角度提出“灾荒→番薯引入”的新模式。认为番薯因具有传统作物并不具备的救灾功能而在灾荒年份被引种,灾荒过后,种植面积减少,出现长时期的“引而不种”。这是因为作为救荒作物的番薯,并未融入当地农作物种植制度。直到清代后期及民国年间,这一状况才在部分地区发生根本性转变。李昕升、王思明(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则重点关注作物引种的影响力,他们在《再谈玉米在中国引种和农民起义发生率——兼与陈永伟等先生商榷》中,对陈永伟等学者的《“哥伦布大交换”终结了“气候—治乱循环”吗?》一文的七点结论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虽然陈文的三个假说存在部分合理性,但是从根本上难以认同,变量选择的正确性同样存在疑问。这一量化历史的研究方式以及对玉米和农民起义之间关系的探索很有建设性,引起在座学者们的重视^①。此外,太平洋诸岛的早期农业也有学者关注,史晓萌、张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前殖民时代太平洋诸岛的渔猎采集和农牧渔业》以前殖民时代太平洋诸岛农业为主线,整理并分析了该地区农业的发展情况,指出前殖民时代太平洋诸岛的渔猎采集和半原始农畜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它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荒蛮和原始,其发展程度已高于同时期的澳大利亚,能够养育诸岛上的土著居民。

史料是农业科技史研究的基础,对许多“旧”史料的解读,往往能发现“新”的学术问题,这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卜风贤(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研究院)《传统农耕技术的二重性:从〈汜胜之书〉到〈邠风广义〉》一文基于石声汉先生的农书研究,考察了前汉《汜胜之书》与清《邠风广义》之间的农史史料,依次从整地耕作、作物播种、收获储藏等方面对古农书中的技术要素进行再检查,认为,通过灾荒史视角的古农书技术资料解读,我们不但可以认识到传统农耕技术进步过程中农业减灾技术水平也在改进提高,还能发现传统农耕技术与减灾技术之间保持一种特殊的依存关系,这种关系持续两千年之久而传承下来,这是我们以前农业史和灾荒史研究中忽略的问题。司徒尚纪(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许桂灵(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屈大均〈广东新语〉的农史价值与开发利用》一文认为屈大均《广东新语》是一部关于广东地方百科全书,其以“语”为纲,阐述广东生物及其群落的来源、生态特征,经济价值以及地域分布等概况,属农业史范畴,有重要科学和应用价值。开展复原其资源分布和开发历史景观,古今对比的研究,可为当今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服务。李林青、魏成刚(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所)的《郝懿行生平订讹及其〈记海错〉中鱼类再探》对郝懿行的生平进行了订讹,并选取嘉鲥鱼、偏口鱼(呀偏、比目鱼)、鲫鱼、刀鱼4种古今辨识难度较大的鱼类从外部特征、生活习性、文献记载等方面进行了探究和订讹。王成(四川省筠连县畜牧水产局)、黄红(宜宾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的《巴蜀历代农业著作初考》一文介绍了巴蜀地区的《三农纪》、《罗江农书》、《活兽慈舟》、《牛经切要》、《猪经大全》、《裨农最要》、《畜宝》等七本地方性农书的作者情况、内容、版本等相关内容,其中有的农书过去少有提及。计算机数据库新技术也开始尝试运用到农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李娜、包平(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基于〈方志物产〉的物产分类体系智能化研究——以〈方志物产〉山西分卷为例》通过分析山西分卷中物产分类特征,结合中国传统分类方法,辅助计算机技术,构建了一套符合《方志物产》的物产分类体系,实现类目名称的智能化规范处理,为《方志物产》内容的数字挖掘及可视化展示奠定语料基础。作者认为该物产分类体系的研究成

① 作者总结陈文的七点结论为:只有“哥伦布大交换”能终结“气候—治乱循环”、清代的农业成就都有终结“气候—治乱循环”的可能性、番薯较玉米有过之而无不及、垦种玉米不是水土流失和农民起义的必然和主要的原因、不能高估清代美洲作物的影响、玉米种植时间久不等于种植强度大、人口膨胀才导致成为食粮的玉米与“大分流”没有联系等七点。参见陈永伟、黄英伟、周羿:《“哥伦布大交换”终结了“气候—治乱循环”吗?——对玉米在中国引种和农民起义发生率的一项历史考察》,《经济学(季刊)》2014年第3期。

果,可以为其它省份乃至全国范围的物产分类体系构建与应用提供借鉴。

二、历史上的农村经济、农田水利、农业生态与农业开发

粮食、土地问题和农民生计等是农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刘壮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清代新疆人均粮食占有状况研究》通过对人口、粮食的流通、土地面积、生产力状况、耕作制度等综合因素的考察,初步揭示了清代新疆各时期各地区的粮食生产和供给状况,勾勒出了清代新疆地区的粮食供给状况的波动过程。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近代中国耕地的“红线”之争》一文系统梳理了学者对中国耕地的“红线”及其问题的主要观点,认为人口压力和减少人口压力说为最具影响的主流意见,反对人满为患和减少人口说仅为少数人的主张,且持主流意见者多是思想上比较温和的学者;而少数后者则多为思想激进的社会改革派和革命家。黄宗智关于华北研究“内卷化”的观点,在学界有一定的影响,隋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世纪30-40年代清苑农户经济行为之间的差异:兼论中国近代华北农村的“内卷化”问题》利用民国“无锡、保定农村调查”中的资料对中国近代农户经济行为进行考察,发现20世纪30-40年代保定收入水平相对高的农户与收入水平相对低的农户在经济行为上有差异,收入高者的人均收入没有出现“内卷化”,而收入相对低者则有“内卷化”的迹象。此外,作者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发现不同农户之间的经济行为确实存在差异。郭爱民(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谷物生产、消费与社会分工关系的解析:基于Agr与Nagr表达式的分析——兼与日美韩三国相比较》以Agr和Nagr模型为基础,通过实证数据,对Agr和Nagr表达式存在的现实意义问题进行探讨,并同日美韩三国的状况作以比较,解析这一时期中国谷物生产、消费与社会分工关系,这一考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和历史地认识农户经济行为。

中国传统社会的地权、土地买卖一直吸引着经济史学界和农史学界,学界持续进行着地契等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其成果新见叠出。程存洁(广州孙中山大元帅纪念馆)《乾隆初年广州府增城县田地买卖契约的演变》通过对乾隆十四年与乾隆二十四年广州府增城县两份田地买卖契约文书的考释,认为两者虽然仅相差十年,但是人们在转移田地所有权时,不再要求严谨细致和面面俱到,不再填写田地的详细信息,只须填写田地面积及田税两项内容,官府也不再要求,其严肃性已然发生了变化。郑勇(福建周宁县博物馆)、周正庆(暨南大学历史系)《从新发现清代闽东山区文书看地权流转特点》一文对收集到的福建宁德地区明代至民国初年将近一万件民间文书文书进行整理与研究,认为清代土地流转过程中,闽东山区土地存在着“田骨权”与“田面权”流转契约书写规范、土地买卖存在多元分割等特点,并指出新发现的文书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研究清代封建社会生产关系有着重要的价值。袁海燕、黄仕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生态史研究中心)《清末民国广州城的地权纠纷与农地开发——以大沙头农地为例》认为从清末开始,广州城的城市化已经有所扩展。不过由于县城官府力量不足,城郊地区基本上处于乡村势力控制的范围。民国时期广州市当局扩展控制范围,以往广州城外大量乡村被纳入广州市管辖区域,但当局虽掌握了大量规划资源,却难以有效行使其使用权,导致土地资源迟迟没有得以合理利用,从而延缓了广州市城市化的进程。关于农村社会研究,周邦君(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考察对象,探析主要动机、创作原理、文本结构、主要内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理论与中国乡土社会的主要实际结合起来,虽在表述上存在若干疏漏,但在总体上为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次会议中,有关水利工程史和水利社会史方面的论文也有提交。何彦超(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宋明时期木兰陂田制度的建立与演变》考察了宋明时期福建莆田木兰陂田制度

的建立与演变过程,认为木兰陂以陂田出租的收益作为其修缮等工作的资金来源,使得数百年的时间里木兰陂修护工作“不费官帑,不削民储”,极大地减轻了当地人民的负担,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价值。张祥稳(安庆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晚清官方尝试建立皖江圩区“巨患奇荒”应对机制典型案例述评——以光绪二十七年和州灾荒防抗救事宜为中心的研究》一文探讨了光绪二十七年和州灾荒的防抗救事宜,作者认为,晚清官方将以往救灾恤难经验与灾情结合,围绕灾区基本民生、维稳和圩堤三大问题,各方力量形成合力,成功建立了一套“巨灾奇荒”防抗救的应对机制,并指出晚清皖省吏治并非漆黑一团。周红冰、郭爱民(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秩序的重建与维持:民国晚期江南水利事务中的乡绅因素(1937—1949)》依据地方志与档案材料,指出在抗日战争期间江南原有的水利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相应的政府水利管理秩序无法有效维持的情况下,乡绅迅速取代了地方政府的作用,成为水利管理中的中坚力量。抗战结束后,乡绅所建立的新秩序成为地方水利事务管理中的主要依据。

此外,也有不少学者的论文关注农业生态史的研究,如陈加晋、吴昊、李群(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生态农业背景下饲料系统的变化与价值——以明清太湖地区为例》从饲料资源开发、饲肥结合等角度出发,重点探析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饲料在生态农业背景下的变化与价值,认为这一地区的饲料资源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开发,饲料系统开始与肥料系统相互结合,具有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现代应用价值。吴建新(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珠江三角洲沙田——一个农田生态系统的多角度和长时段研究》简析了珠江三角洲沙田区的历史开发过程,提出应该从多角度对其进行整体性的研究,且长时段的研究应延伸到当代。邵侃(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藏族传统生计与黄河源区生态安全——基于青海省玛多县的考察》对“黄河源区第一县”——青海省玛多县生态环境和藏族居民的传统生计进行了考察,认为藏族传统生计能够有效规避当地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实现了生态环境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的兼容,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源区的生态安全问题,应当重视对藏族传统生计的保护、发掘和利用。

农业与王朝经济发展、地区开发是农史研究的传统领域,这一领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持续关注。张凤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秦汉时期汉中地区的农业开发》探析秦汉时期汉中盆地与汉中郡东部的农业开发状况,认为秦汉时期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和大一统的局面为汉中地区的农业开发提供了强大的基础动力、物质保障以及稳定的发展环境。汉中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是秦汉社会文明发展的一部分,奠定了这一地区农业后续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刘养卉(甘肃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两宋时期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探析》主要研究两宋时期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表现与原因,指出尽管这一时期战时纷纭,但我国的农业生产仍有长足的发展,农业发展水平大大超过唐朝,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陈明(中国农业大学农业史研究室)《清代改土归流后湘西地区农业结构的演变》主要利用清代湘西地方志探讨改土归流后湘西地区种植业、畜牧业、林业等农业不同部门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认为改土归流后湘西地区农业结构出现了新的格局,人口增长是农业结构演变的主要原因。衣保中(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清末图们江地区的土地开发与农业发展》指出清政府在延边地区逐渐废弛了封禁政策,改行移民实边的招民垦荒政策。在此政策下,不仅汉族移民大量进入延边地区,朝鲜移民也迁入图们江流域,使得图们江地区的人口和开垦的土地都有了迅速的增加,边疆农业和工商业也有了初步的发展,各族人民为祖国东北边疆的开发和边防的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农业遗产与农业历史文化

农业文化遗产的开发和保护也是此次会议的议题之一。随着 21 世纪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

加快,很多传统优秀的作物品种、农业技术正在消失,学界为此积极呼吁保护、开发和利用农业文化遗产。陈志国、倪根金(华南农业大学)《茂名荔枝农业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与利用》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通过对茂名荔枝栽培历史进行考证,对茂名荔枝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和价值进行分析,认为茂名荔枝栽培历史悠久,人们在长期的栽培历史中形成了独特的农业文化系统,并进而提出相应的保护与利用措施。李云鹏(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谭徐明(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浙江诸暨桔槔井灌工程遗产及其价值研究》通过田野调查、文献考证等方法,分析了诸暨赵家桔槔井灌的历史演变、遗产构成、工程特性及其科技文化价值,认为诸暨桔槔井灌具有独特的历史、科技和文化价值,是早期灌溉文明的活化石,在近几十年遗产范围快速萎缩的形势下,应予以保护。万金红、谭徐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东风堰灌区灌溉遗产价值分析》以四川乐山夹江东风堰为例,探讨了川西地区沿江引水灌溉形式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传统的灌溉形式虽然在今天逐渐不能满足现代农业灌溉的要求,但其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是当前农田水利需要学习的地方。李琦珂(中国农业博物馆)《当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依据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遗产项目的问卷调查内容,结合对具有代表性的9个农业文化保护遗产项目进行实地调研数据,揭示出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普遍存在的八大主要问题,并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性。时少华、孙业红(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社会网络分析视角下农业遗产地旅游发展中的利益协调研究——以云南元阳哈尼梯田为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以云南元阳哈尼梯田为例,对哈尼梯田遗产旅游发展中利益相关者所构成的利益集团进行了网络凝聚性、等级性和代理性指标分析,认为应塑造政府、企业和社区之间密切的利益关系,形成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重点加强社区在利益关系网络中的决策力与话语权。惠富平(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明清莞香文化考述》认为明清时期在海南沉香趋于枯竭以及沉香需求的刺激下,莞香生产和贸易后来居上,兴盛一时。东莞人将人工种植与天然生成相结合,在莞香生产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种香、采香技艺,寮步香市及莞香贸易亦久负盛名,中国香料史进入莞香时代。这为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提供了参考。

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包含了诸多积极因素,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李潇云、惠富平(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牡丹文化史论略》在全面搜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古代牡丹栽培与观赏的历史过程及各个阶段特点,指出在当今中国的盛世环境里,牡丹历史文化必将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刘铭(山东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漫谈萤火虫民俗文化》一文系统梳理民俗中的“腐草化萤”说,探析与萤火虫相关的民俗节日、典故和歇后语,分析萤火虫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途径,认为作为一种民俗文化资源萤火虫文化的开发和利用前景广阔。张蕾(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古人对水生植物的认知与水景创造》通过梳理《管子·地员》、《诗经》、《尔雅》等古籍中对水生植物的认识,提出古人从对水生植物及其生境的观察、熟悉与欣赏中形成了不同且渐渐固化的水景意象,并不断地在诗歌、绘画和园林建造中加以重复表达,构成了中国传统时期极具美感且有意境的审美形式,体现了中国古人的自然观与人文情怀。乔柏(广西师范大学产业经济与人才发展战略研究所)《简论中国传统农业发展中池塘元素的作用——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蓼村古池塘为例》以广西北流市民乐镇蓼村古池塘为考察对象,认为池塘存在及其功能与中国农业社会发展,具有高度契合性与互补性,是中国古农业不可或缺生态美学,其中包含诸多天人合一的人文价值。王加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观念、时势与个人心性:南宋楼璘〈耕织图〉的“诞生”》则对南宋楼璘《耕织图》作了社会文化史的解读,他从宋代人们看待绘画观念转变、南宋初期政治社会形势与作者个人因素三个方面深入探讨楼璘《耕织图》在南宋初年“诞生”的原因,并指出其是后世绝大多数体系化耕织图的“母图”,而这些图绘成为历代王朝进行社会教化的重要工具与媒介,体现出深远的象征与社会治理意义。党晓虹(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虚置与重构:论乡规民约的当代困境及未来走向》

认为农村社会的历史性巨变、乡规民约自身建设的诸多问题以及国家力量的过度干预,导致了乡规民约逐渐虚置化,对乡规民约的价值认同、国家—社区组织—广大村民等治理主体合理的角色配置、科学的制度重构、完善的措施保障,是乡规民约摆脱虚置、重新焕发活力的可能路径。除了以上具体的、形而上的农业文化,还有抽象的、形而下的农业文化,这些农史文献、古农学家所包含的思想内涵赋予了我们某种精神层面的文化意涵。孙金荣(山东农业大学文法学院)《〈齐民要术〉天地人和合思想及其文化意义》主要研究《齐民要术》对“天地人和合”思想的借鉴与传承及其理论的实践,探析该书中“天地人和合”思想的文化渊源,认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借鉴其中“天地人和合”思想。李兴军(潍坊科技学院)《〈齐民要术〉农学文化思想之科学精神探析》一文通过梳理《齐民要术》中有关贾思勰对农业科学知识的表达信息,从其重视与推广、注重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两个方面探究其农学文化思想的科学精神,认为我们应该传承与发扬这种科学精神。除学界外,地方政府也积极投入到农业文化的挖掘与传承上来,如张永忠(东莞市农业局)《以〈耕读〉为媒挖掘传承东莞农业文化——一个高度城市化地区农业文化建设的探索》谈到东莞农业局通过明确农业文化遗产的责任、组建农业文化小组、创办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耕读》等措施,对如何挖掘和传承东莞地区历史时期留下的农业文化精髓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此外,中国农业高校的发展历史及学科建设史也有学者关注。尹北直(中国农业大学农业史研究室)《北京农业工程大学(1952-1995)的发展变迁与历史成就》简要介绍了北京农业工程大学从1952年创立到1995年间的发展过程,认为其反映出中国高等农业工程教育的演进脉络和“农业工程”学科群在中国发育、革新的历史,其育人成就和办学特色对中国农业工程教育乃至农业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昌武、李兴军(潍坊科技学院)《基于传统农学文化思想的农学特色学科建设研究——以潍坊科技学院为例》简析了基于传统农学文化思想下潍坊科技学院农学特色学科建设过程,指出只有深入挖掘中国传统农学文化,并进行创新性地发展,才能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农学特色学科。还有的学者认为,农史学科可以赋予我们终极关怀层面的意义,齐文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农史何以观照人类命运问题?》一文从生态命运、社会命运与生活命运三方面探究人类命运,认为农史学科可从“强调传统价值,借鉴历史模式”的角度,对人类命运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提供观念借鉴和智力支持,并认为用农史视野观照人类命运问题,并不是号召人类重回农业社会,过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而是在“强调传统的价值”意义上,挖掘传统中的有益因素。贾兵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中原科技文化研究中心)的《基于文献计量方法的我国水文化研究态势分析》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为检索对象,采用高级检索方式,对检索出来的关于“水文化”的论文,从学科分类、发表年度、文献来源、关键词、研究机构、基金项目及论文影响力诸方面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认为学界对水文化研究呈现出多学科、多领域、多层次研究格局,初步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团队、研究机构和研究方向,但该方面有原创性与基础性的理论研究略显不足。对水文化研究做了客观的回顾。

会议期间除开展了热烈的学术研讨外,还举行的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等文件,选举产生了学会第六届理事会成员和新一届领导机构。